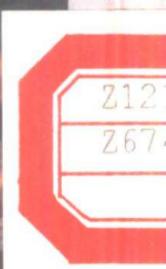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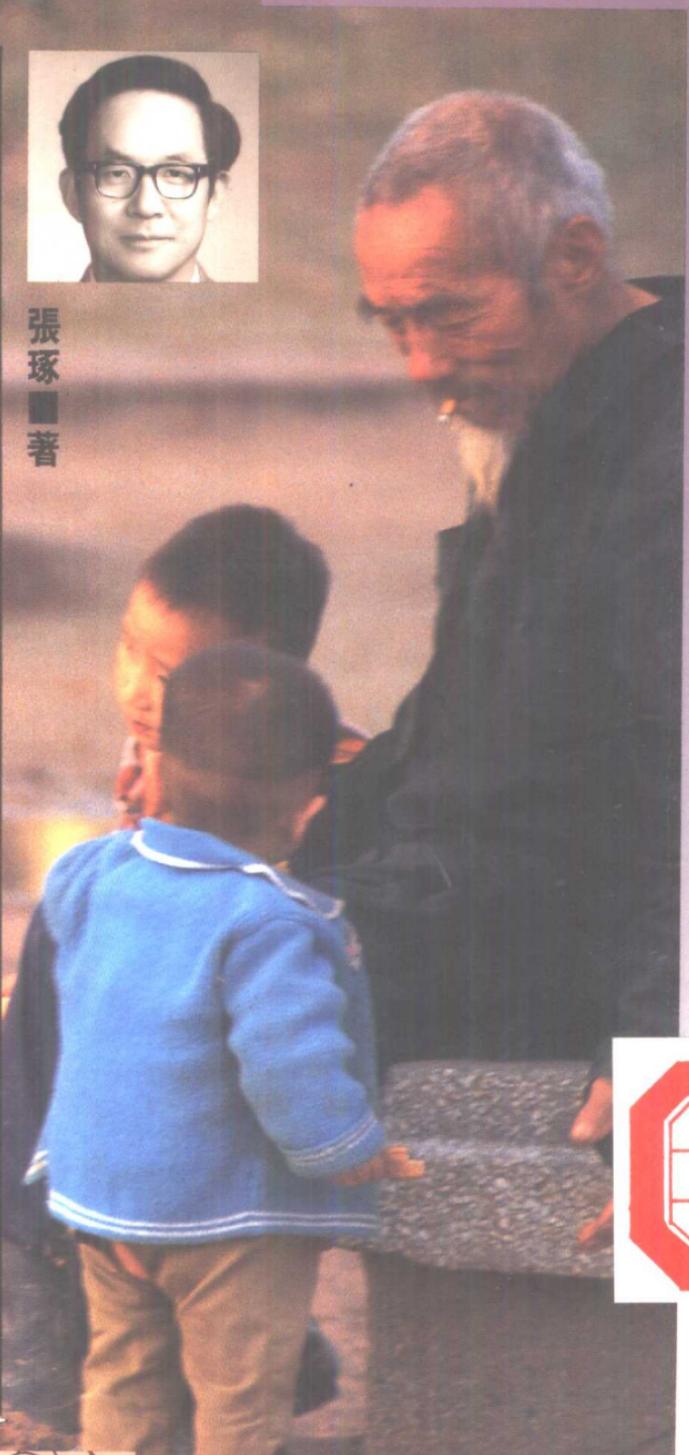


中國社會和社會學百年史

張琢 ■ 著



中華書局

Z121.7/091-07
Z674

中國社會和社會學百年史

百家文庫·史論集

張琢著



中華書局出版

百家文庫

史論集

□ 責任編輯·盧建業

中國社會和社會學百年史

□

著者

張琢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5B-5F 2樓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葵涌嘉業街10號

益高工業大廈12樓B座

□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60 3

小引

什麼是社會？

在我們的老祖宗那裏，原本的意思與現在有聯繫，也有區別。這詞在創始時主要是表示人們集合在一起的祭祀活動。人是集合的主體。祭祀的對象是客體。人們集合在一起的祭祀活動，體現的是主客體之間的一定關係。以後，隨着社會生活的發展，其外延和內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許多祭祀活動不過是借祀社節日之機，搞點文化娛樂。一些文人學士以文會友的集會、結社，離祭祀的意思就更遠了。現在廣義上使用的社會（中國社會學家們稱為「大社會」），一般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作為社會存在的客觀環境（社會舞台）；（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三）人們結成一定的關係利用客觀條件創造出的文化（包

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可見今天的社會這個概念是由古代蛻變和發展而來的，並有所承轉和增益。

社會概念由古到今的發展和變化，首先是由於社會生活本身的發展變化。我們一般把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叫做中國古代社會。因為古代社會在長期的發展歷史過程中形成和積澱下了許多傳統的東西，所以人們又把古代社會叫做傳統社會。中國的傳統社會主要是建立在手工勞動的農業自然經濟的基礎之上，相對於現代以機器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工業社會，人們便把它叫農業社會。這種農業社會的社會政治組織是一種封建宗法結構，故又被稱做封建宗法社會，簡稱為封建社會。

對於一八四〇年以後的中國社會，過去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一般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劃線，把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十年稱為近代，謂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稱為中國現代，稱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種政治史、經濟史及思想文化也多採用的是這種劃分。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便感到這樣的劃分越來越不夠了。因為這個劃分是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就提出來的，那時新生的共和國自身還沒有多少「史」可言，而今天共和國也已過了四十二年了。昨天的今天，已成了今天的昨天，而且歷史仍在日日、月月、歲歲不停地延續……那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史該叫做什麼時期合適呢？還是文學最敏感——文學是反映時代前進跳動的脈搏——詞也多，他們首先在六十年代就想出了一個詞，把共和國成立後的這段歷史叫做「當代」，但是「當代」了不久，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就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後痛定思痛，便出現了反映「文革」創傷的「傷痕文學」；而一面在撫摩着「傷痕」，同時改革開放的奏鳴曲又響起來了，再何以名之呢？延綿不絕的文學史卷上又出現了「新時期文學」的篇章。

這實在叫人有些眼花繚亂，而且困惑：「現代」，「當代」，「新時期」，在語義上能分得那麼清嗎？但是為了研究方便，總要有個劃分才行。這種劃分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即根據社會歷史自身演變過程的階段性來劃分。不同的學科可以根據其研究的不同對象，不同側面、宏觀與微觀不同空間領域進行各自的劃分。沒有這種區別，就沒有學科的分工。當然，各學科之間由於所研究對象的統一性，也存在必然的相互聯繫和共識。

社會學從一般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分化出來，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當時的法國和整個西歐、北美正處於工業革命（或稱為產業革命）的高潮中。產業革命是社會現代的核心和根本動力。它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的和社會的變化，如：產業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的分化，城市化的加劇，生產社會化的擴大，人的生活的全面社會化過程的加速，人口、就業、犯罪和對社會保障的需求等諸多社會問題日益增多……。這一切正是呼喚社會學出現的强大動力；而產業革命創造的物質基礎，各種社會統計資料的積累，各門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和統計學）所提供的理論武器和手段，便為社會學的應運而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所以可以說，社會學就是社會現代化的產物。它是在社會現代化的變遷過程中產生，以社會變遷過程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社會科學。中國也是在社會現代化變遷過程中，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維新時期開始引進社會學的。中國社會學的中心主題始終是中國的社會變革和現代化。本書即以現代化為主線，來講述這一中國社會和社會學的發展過程。時限上起康有為一八九一年以「羣學」之名開講社會學始，下迄筆者此書截稿的一九九一年，正好整

整一百年。

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或稱產業化），而工業化的核心又是用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勞動。所以，機器生產的採用就是現代化發軔的重要標誌。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作為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挑戰的回應，陸續提出了學習西方的「長技」，發展機器製造工業的口號、綱領、理論、戰略和計劃，並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出現了機器工廠（先是洋人開的，接着在六十年代便出現了國人自辦的機器工廠）。從此以後，雖然經過了許多曲折，包括改變社會制度的政治大革命，但是工業化的進程始終沒有中斷，而是在波浪式起伏中前進。現在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已進入發展的關鍵時期。根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長期發展戰略計劃，預期到廿一世紀中葉將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中國現代化十九世紀被動地開始，到廿一世紀自主地實現，歷時計約兩個世紀。這兩個世紀既都屬於現代化的過程，本書又以現代化為主體，並兼述百年社會學史，就不再作「近代」與「現代」之分，也不採用「近代化」和「近代性」的概念，而只採用「現代化」和「現代性」及「現代性因素」的系列概念。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歷盡坎坷和艱辛的逐步推進的過程。從發展類型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被動的「依附型現代化」向自主的「趕超型現代化」逐步升級的過程。從發展的主體看，是由少數先驅者匯集成精英集團，進而由新興的階層、階級（通過政黨）逐步推向全民族的過程。從內容上看，其外延是由單純的學習西方現代軍事技術逐步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擴展為全面現代化的過程；就其內涵而言，即由表層的器物模仿向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根本變革逐步深化的過程。從空間（地域）上看，則是由點（少數通商口岸）到線（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到面（由東部到中部、到西部）梯度推進的過程。從時間軌迹上看，中國現代化經歷了多次風雲變幻，呈現出波折多、起伏大、而又未間斷的發展曲線。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爆發，可謂中國現代化的發軔期。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投資於新式工業的外國在華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及民間資本的總額已達十一億三千七百萬元；僱用工人總數，據較早的不完全估計為九萬一千八百五十至九萬八千零六十人，如果加上交通、電訊等新式產業的僱員，數量會大得多。在這期間外國資

本主義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十三個不平等條約，開闢的通商口岸（史稱「條約口岸」）已達三十五處，分佈在十八省。現代中國沿海和長江港口的大格局已基本形成。資本主義勢力已逐步伸入到中國內部。西方的科學技術、教育、文化（包括宗教）迅速在華傳播。洋務運動建立了新式連隊和初步的軍火重工業，但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統治，並沒有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反而使中國日深一日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就正是一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上的二元結構的概念。

這半個世紀的社會變遷，既為中國的社會變革向更深層推進提供了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於是，中國的現代化便從洋務時期的基本上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推進到了維新變法時期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層的變革。正是在維新運動的醞釀過程中，社會學也應運在中國問世了。

目 錄

小引

一 維新與社會學	· · · · ·
改良思潮的醞釀	· · · · ·
中國社會學發軔	· · · · ·
維新變法的嘗試	· · · · ·
義和團的得與失	· · · · ·
清廷新政的回光	· · · · ·

二 三〇 八 四 一 一 一

早期社會學著譯

三〇

二 辛亥到「五四」前

三一〇

- 封建帝制的推翻 三六
軍閥與復辟逆流 三六
社會學初步發展 四四

四七

三 「五四」後三十年

五五

- 新文化運動勃興 五五
社會結構二元化 六五
共產黨及其綱領 七八
國共合作與分裂 八二
三種形態的發展 九四

全民族團結抗日 一〇一

兩種命運的決戰 一〇七

社會學多元嶄嶸 一一二

四 共和國前卅年 一二六

發展條件初到位 一二六

社會學科被撤消 一三七

現代化試步告捷 一三九

「馬鞍形」中的成就 一四九

「文化革命」的浩劫 一六一

五 現代化新時期 一八一

歷史性戰略轉變 一八一

二次長征三步曲	一八九
社會學應運復興	二二〇
附·本書主要參考文獻	二二三

一 維新與社會學

改良思潮的醞釀

還在甲午戰敗之前，面對國內政治的腐敗，外國資本主義全面入侵的刺激度和刺激面日益深廣，洋務運動的發展及其弊病的顯露，民間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出現和受到的外國資本主義及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擠壓，引起了人們越來越深刻的反思。

這些人多為留學和出使外國，比較了解西方國家的情況，同外國資本洋務活動、清政府當局及民間資本打交道或參與其間的活動的人物。由於他們既有程度不同的西學知識，又對幾方面的實際內情和相互關係有較深切的了解，省悟到中國必須改革才能發展資本主義，才能適應時局的變化，對付外來的挑戰。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馬建忠、薛福成、

鄭觀應等。

留學生馬建忠在一八七七年從歐洲上書給李鴻章說，他初到歐洲時，「以爲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擴商爲本，求强者以得民心爲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適可齋記言記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但是，馬建忠經實地考察西方議院後又覺其虛偽，因而不贊成在中國實行議院制度。

王韜，青年時代曾在上海教會書館中工作，後去香港從事翻譯，又赴英、德、俄考察，回國後在香港主編《循環日報》。他介紹說，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類型的國家。他最推崇的是君民共主，可使「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弢園文錄外編》）。

鄭觀應，先做買辦，又兼營工商，痛感列強以「通商」之名「漸奪中國之權利，並侵中國之地」（《易言·論傳教》），因而應洋務派之聘入招商局，以「奪洋人之所恃，收中國之利權」（《易言·論船政》）。後來又參加反法戰爭，被太古洋行執注拘於港府，歸

來遂作《盛世危言》。此外，資本主義先發國家已漸次向壟斷過渡，進入了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掠奪殖民地的競爭更為瘋狂。《盛世危言》正好在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版，他在該書中敏銳而深刻地揭露了日、俄、英、法侵華的嚴重態勢，預警日本將先佔朝鮮、進迫中國，野心已畢露：「近來日本講究水師，頻添戰艦，多置軍械，及遣人分住各口……時入內地，暗察形勢，繪圖貼說，其志叵測」（《盛世危言·海防下》）。而且，鄭觀應不是孤立地講「兵戎」的嚴峻形勢，還進一步強調了「商戰」（他的商戰的具體內容包括工業）的重要性，主張「借商以立國，借兵以衛商」（《盛世危言·商務》）。他尤其突出地強調設立議院才是「富強之本」：「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用心，教養得法」。他說：「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炮、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認為洋務派是「遺其體而求其用」（《盛世危言·序》）。在中學與西學的關係上，《盛世危言》雖然主張「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但是實際上是意在移花接木，為引進西學正名，與後來的反改革派以此來抵制政治制度的改